

在深化中华文明探源中彰显河南担当

师永伟

作为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地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河南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占居核心地位,充分彰显其在深化中华文明研究和传承弘扬中华文明中的责任与担当。总的来说,这就需要探源溯流,持续推进考古事业;培根铸魂,做好研究阐释工作;守正创新,在活化利用上下功夫。

以持续推进考古发掘为重点, 夯实河南的核心地位

中华文明探源以考古发掘为基本支撑,河南是重点研究区域之一。自2002年始,河南先后有灵宝西坡、登封王城岗、新密新砦、偃师二里头、荥阳大师姑、禹州瓦店、郑州西山遗址、巩义花地嘴遗址、邓州八里岗遗址、巩义双槐树遗址等重要考古遗址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实证了不断裂的中华文明史,承载着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五千年的文明史。

继续聚焦夏文化考古研究,以偃师二里头遗址为重点,继续做好禹州瓦店、新密新砦、登封王城岗等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同时以历史文献记载为线索,加强对济源原城遗址、巩义稍柴遗址等夏文化核心区遗址的考古探查工作,在必要时进行适当的科学考古发掘;另外,还要关注和进行河南境内,如豫东、豫南、豫西北及其周边地区夏文化探索薄弱区域的考古调查等工作,以探索和实证夏代广域王权的势力范围及“禹征三苗”“后羿代夏”等古文书记载中的关键问题。

进一步提升考古事业的现代化水平,在发掘中实现多学科共同参与,开展和实现人与生态环境、植物和动物考古、体质人类学、古DNA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等的考古发掘和同步研究工作,对文明化进程、生态环境、生物形态、社会分化、文化融合等方面提供材料支撑。在回答好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基本图景、内在机制以及各区域文明演进路径等重大问题中作出河南贡献,发出河南声音,彰显河南特色。

此外,还要着重深化对栾川人、灵井人和仙人洞原始人化石等古人类进化史,李家沟遗址、裴李岗遗址、舞阳贾湖遗址等农业起源及发展史,濮阳西水坡遗址、南阳黄山遗址、三门峡仰韶遗址等文明发展史的相关遗址的考古发掘及研究,通过实验考古、环境与资源调查、石器制作技术实验等技术,全面展示河南在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以大力加强研究阐释为重点, 凸显中华文明中的河南元素

从宏观上讲,加强中华文明探源的研究阐释就是要阐释其蕴含的历史价值、时代价值和世界价值,努力实现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与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不断提升中华文明影响力和感召力。

建设和推出一批标志性文化工程。建设具有中原特色的博物馆群,建设河南考古博物馆,因地制宜建设地市考古博物馆,提升重要遗址博物馆的布展水平;建设和谋划考古遗址公园,重点展示考古遗址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影响;与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相衔接,重点是与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相衔接,谋划一批文化工程;推出系列具有影响力的重大研究成果,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重大课题中的独特作用。

提升一批考古研究中心。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郑州、洛阳等地的文物考古研究院(所)为中心,依托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考古学专业,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整合力量,从考古现场信息提取到实验室检测分析再到综合研究、数据库建设、资料与信息交流共享,均采取联合攻关的形式,深度参与文明起源、农业起源、中华文化的精髓、中西文化交流以及考古遗存与社会组织形态、族群族群的对应,考古学文化与中华文明理论的建构等重大问题的研究,提升全省的考古研究水平与能力,多维度、全方位展现河南的厚重文化底蕴。

构建良好的研究阐释生态。从中华文明中汲取现代化河南建设的深沉力量,为实现“两个确保”贡献文化力量;各级部门要重视文物、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考古发掘工作,为历史和考古工作者开展研究、学习深造、研修交流提供更多政策支持;构建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鼓励长期的潜心研究;与兴文化工程相结合,设置专业课题,鼓励全社会揭榜挂帅式研究;加强考古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一批创新型、复合型研究人才,储备人才队伍,多出研究成果。

着力缩短研究阐释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从学理上解决与大众间的沟通问题,以公共考古及公共阐释、公众史学等理论为依托,实现其公共价值;在具体行动上消弭与大众间的距离,加强考古专业人士与公众间的沟通与交流;在利益机制上推动与大众间的结合,以经济效益为带动,兼顾社会效益,加速历史文明普及、提升大众文化素养,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要。

以全面实施文旅文创融合战略为重点, 提升河南的活化利用水平

文旅文创融合战略是河南省提出的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是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和广泛宣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成果,教育引导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好认识和认同中华文明,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的重要

手段和载体,还需制定和出台关于文物活起来的相关指导和实施意见,依托专业的考古和文旅机构,适时成立河南考古旅游研究院(中心)。

打造一批考古旅游示范基地。在河南省范围内分批次遴选一批文化特色鲜明、文旅融合势头强劲、考古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域建设考古旅游示范基地,以二里头、殷墟、庙底沟、大河村为引领,分层级、分阶段公布名单并给予相应支持,最终构建完善的“放射状+网格化+板块式”的区域联动格局。考古旅游示范基地要抓住重点人群,尤其是青少年人群,把考古研学基地建设作为重点工作,建设国际考古研学中心,筹办国际考古旅游大会并发起成立国际考古研学旅行联盟。

瞄准文旅文创的融合点。把考古旅游作为文旅融合的有力支撑,就要在资源、空间、要素、功能、主体、战略六个维度实现融合,大致来说就是要实现:旅游资源有效整合,注重与自然风光的有机结合,建立资源统筹机制以及动态资源数据库;空间地域大视野谋划,兼顾国内国际、乡村城镇,同时建立文化特区;旅游要素集聚且有特色,根据资源风格,注重主题游和文旅综合体建设;功能多元独特,拓展在教育、研学、娱乐等方面的功能,但必须牢记核心功能;主体做大做强,新建专业旅游团体,改革重组现有相关机构,打造专业领域的劲旅;战略相互支撑,与乡村振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等战略相结合,寻求战略间的相通点。

推动文旅文创的迭代升级。首先是文物游向文化游升级,在考古遗址核心区,尤其是考古遗址公园、具备开放条件的考古现场开辟公共考古体验场所,大力推进科技赋能,展示和体验考古发掘过程以及文物修复等环节,把文创贯穿于旅游全过程,提升游客的文化体验程度,发展沉浸式旅游,同时注重发展全域旅游,统筹红色文化资源、非遗等特色文化;其次是单线游向多元游转型,以文化体验为主,同时兼具生态游、山水游、民俗游、科技游等要素,制定科学合理且有吸引力的旅游线路,弥补传统考古旅游线路单一、内容枯燥的短板;最后是传统旅游模式向菜单式模式转变,推出旅游菜单,在内容、线路、时长及其他服务等方面采取订单式服务,提升以郑州洛为核心的世界级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以此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周恩来总理赠送给酒泉十工道班的东方红75型推土机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展出的载人飞船返回舱

甘肃工业遗产的历史再现之路

史勇 刘木子

20年前,国际工业遗产保护协会(TIC-CIH)于俄罗斯斯塔吉尔通过在工业遗产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下塔吉尔宪章》,明确了工业遗产的定义、价值、保护利用路径等概念,工业遗产作为新品类文化遗产自此逐渐成为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业界实践探索的亮点、公众广泛关注的焦点。

甘肃近代工业的星星之火早在晚清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时期即已点燃,兰州制造局、甘肃机器织呢局、兰州黄河铁桥等工业文明结晶曾是甘肃的“硬核名片”。抗战时期,战时经济带动了甘肃工业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甘肃成为工业重镇,兰州被确定为“一五”时期重点建设的12个工业中心城市之一;随着兰州、天水、白银、金昌、嘉峪关等一批工业城市的崛起与兴衰,在陇原大地上留下了众多底蕴深厚、价值突出的工业遗产。《下塔吉尔宪章》公布以后特别是进入新时代,甘肃在工业遗产保护特别是陈列展示方面,走出了一条历史再现之路。

《下塔吉尔宪章》规定:“每一国家或地区都需要鉴定、记录并保护那些需要为后代保存的工业遗产。”甘肃将“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以全国文物普查为主,地方工业遗产调查为补充,基本厘清了甘肃省工业遗产家底。甘肃制造局旧址、孔繁锦造币厂旧址、阿干煤矿、玉门油田老一井、窑街煤矿、兰州水厂旧址、兰州佛慈制药厂、华亭煤矿第一井、白银露天矿一采场、刘家峡水电站、国营长风机器厂旧址、金川公司露天矿老坑、徽县酒厂旧址、成一大井、引大入秦工程等工业遗产入选甘肃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银光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国营805厂)、白银国家矿山精神纪念馆、玉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等国有文物收藏单位的近两百件工业文物被调查登记为国有可移动文物。兰州市实施了全市工业遗产调查,成果汇编为《兰州工业遗产图谱》,收录30余处保存相对完好的代表性工业遗产,涵盖煤矿、石化、冶金、军工、航空航天、机械制造、印刷、制药、纺织、建材、地方特色手工业等,并绘制了兰州工业遗产分布示意图,编制了兰州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初步规划。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玉门油矿、中核404厂、中核504厂、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先后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下塔吉尔宪章》规定:“建立专门的工业和技术博物馆,是保护和阐释工业遗产的重要途径。”近年来,甘肃兴办了一批各具特色的工业遗产博物馆,为文化强省建设注入了强劲的工业文化动力。

重工业类工业遗产博物馆展现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基造血故事。石油和钢铁是工业的血脉与食粮。玉门铁人王进喜纪念馆陈列展览以铁人王进喜的成长历程为主线,以玉门社会发展和玉门油田发展为辅线,以版画、照片、实物生动诠释了首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铁人精神”。酒泉钢铁公司展览馆、镜铁山矿业有限公司铁山精神展览馆,用工业遗产展示企业文化,用实物和文献展现一代代酒钢建设者“明知酒钢苦,偏扎酒钢根”的创业与奉献精神。铜、镍、钴属于战略性金属。白银矿山纪念馆依托工业文明陈列馆和国家矿山公园矿业遗址景观,多视角凸显“功勋铜城、魅力白银”主题。金川区镍都开拓者纪念馆集中展示了20

世纪50年代以来,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齐聚金川,为共和国镍钴工业基地建设战风沙、斗严寒的动人事迹。

国防军工类工业遗产博物馆展现为共和国铸盾的峥嵘岁月。“两弹一星”奠定了大国地位,挺直了国人腰杆。甘肃是新中国重要的核工业和航天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导弹试验靶场,也是目前我国唯一的载人航天发射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历史展览馆位于发射中心10号场区,展出实物943件、文献56份、视频13部、图片871幅,生动诠释了首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中核四〇四展览馆位于甘肃矿区(国营404厂)原职工俱乐部,展品包括图片文字资料2300余份、实物120多件、模型11个,全面反映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体系最完整的核科研生产基地创建发展历程,记录了老一辈核工业人“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光荣事迹。

三线建设类工业遗产博物馆展现地方工业化壮阔图景。自1965年始,波澜壮阔的三线建设全面铺开。甘肃是三线建设重点地区之一,相关工业遗产成为地方工业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时代印记。天水市积极探索将“工业锈带”打造为“生活秀带”,依托天水长城控制电器厂、国营岷山机械厂等三线企业旧址,兴建天水工业博物馆、岷山军工博物馆,特别是天水工业博物馆综合运用工业遗产原状保护、工业文物实体展示、工业科技互动体验等形式,浓缩天水百年工业发展史。位于关山深处的华亭三线建设博物馆,依托原5203厂、5204厂总指挥部遗址等军工文化遗址,以500余件图文、实物、影像展示“五二工程”筹建、发展、转型、搬迁历史,为公众认知三线建设对于甘肃地方经济社会的影响提供了窗口。

地方建设类工业遗产博物馆展现甘肃精神和陇人品格。新中国成立后,甘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用双手建设幸福美好家园。引大入秦工程是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跨流域调水自流灌溉工程,被誉为“地下运河”“西北都江堰”;引大入秦工程展览馆以全景沙盘、主题雕塑、图文展板、实物档案、多媒体演播等手段,全面展现了工程概况、建设历程和发展展望。甘肃公路博物馆前身系酒泉公路总段“十工陈列馆”,是全国首个公路专题博物馆,藏品5000余件,馆藏文物中的“镇馆之宝”是1971年周恩来总理赠送给酒泉公路总段十工道班的东方红75型推土机,这件珍贵的工业文物承载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关心西北交通建设和基层劳动者的红色史话。

上述还是甘肃工业遗产历史再现工程中的代表性项目,还有不少注重企业文化保护传承的单位在厂史、矿史实物与文献征集展示方面同样富有成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甘肃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工业是甘肃实体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富民兴陇最为关键的产业支撑。”深化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特别是工业遗产博物馆建设发展,对于增强公众的工业强国、工业强省意识具有不可替代、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甘肃工业遗产的历史再现之路前景可期。



二里头乳钉纹铜爵

从春秋吴越看江河流域融合之历史

卓子舜 汪芳

“禅让”这么简单。他们把黄河流域的文化、生产经验也一并带到了南方,促成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文明的交融。

吴钩与人工运河技术

史料记载,吴人尚武。吴国工匠铸剑,其青铜剑以工艺精湛,品质优良闻名于诸侯,著名的干将莫邪、鱼肠、湛卢都出自吴国。随着吴王阖闾的继位,吴国转而勒令工匠制造形制怪异的吴钩。唐代诗人李贺云:“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吴钩这样形制的兵器的诞生,绝非偶然。

吴国位于今天的江浙一带,往东是大海,往南是更荒凉的地区,谋求发展只有两条路,一条北上,一条往西。如果当时往西就会和长江中游的强国楚国相遇,而此时吴国没有实力同荆楚角力;如果北上谋求发展就必须先经过淮河,但长江与淮河之间,没有天然水道。

在司马迁的笔下,吴王阖闾借助人工运河,实现了“通渠三江五湖”,而后继任者吴王夫差,完成黄河、长江、淮河三大水系的联通。为了让吴国顺利进入黄河流域,夫差做了一件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事——启动了著名的邗沟运河工程。邗沟运河的开通,是中国目前史料记载较早的战略级运河工程。通过邗沟运河,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被连成一体。为了能进一步在黄河和淮河之间运送物资,夫差还在黄河和淮河之间增加了新的运河。致使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实现了密切联通。

为了适应水战,吴国工匠研发了阻力较小且方便携带的弯刀——吴钩,这种武器除了适配舰船水战,还在山岳连绵的南方作为采集和砍伐道路的工具。

《史记》与流域融合传统

《史记》又名《太史公记》,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作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从行文结构也能看出太史公的深思熟虑,然而《史记》记录诸侯助饷的世家篇,却是从吴国开始。在诸侯国里,吴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与齐国、鲁国、燕国相差较大,是一个非常边缘的存在。按常理来说,“世家”的第一篇应具有较高的历史地位,而司马迁为什么要从《吴太伯世家》开始写起?

明代李光缙的《史记评林》以及清代梁玉绳的《史记集解》都把焦点放在道德上,关注吴太伯的礼让,把国家权力让给弟弟。但其中更重要的是吴太伯的开拓精神,他和弟弟离开了发达的黄河流域,奔赴吴地,促进了黄河和长江流域的跨区域交流和融合。在那个时代,黄河流域远比长江流域发达。

不难看出,吴太伯兄弟的远走,不只是